

大器晚成

克里斯·威利兹采访大卫·奥特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曾就进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如果你在午休时间经过大卫·奥特尔 (David Autor) 的办公室, 会发现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正在津津有味地啃着他从家里带来的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这不仅是因为奥特尔喜欢花生酱和果冻, 还因为这样做能帮助他节省下楼去餐厅就餐的时间。

53 岁的奥特尔在最近接受的一次采访里说, “我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如果我不是在工作, 那就是在做其他一些有用的事情。” 这些有用的事情包括跟儿子一起去航海、担任冰球队的队长, 或者把电子产品拆开再重新装回去。接受采访时,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望向窗外的查尔斯河。

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资源稀缺性的学问。时间对于奥特尔来说似乎永远不够用, 他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起步很晚, 总感觉还有很多工作要赶着去完成, 虽然他已经在贸易和科技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奥特尔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大量研究报告——关于从残疾福利到最低工资问题的 29 篇期刊文章——渗透着对工作尊严的尊重、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对失业给家庭和社区带来的损害的关切。

“失业可不是一件好事。” 奥特尔表示, “工作给人们的生活赋予了内容和意义, 给予人们一个身份、一个社会圈层。” 他并不同意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 那些经济学家认为工作只是人们为了消费而付出的代价。“这种说法对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成立的。我们是为了保住工作而愿意付出代价。”

作为一名学者, 他实际上拥有超乎寻常的实际工作经验: 他曾经做过计算机软件顾问、弱势群体儿童教师、医院行政助理等。所有这一切都给了他对于所研究课题的实践认知, 也让他更愿意用事实去验证理论, 有时甚至是挑战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经济学理论。

比如, 奥特尔曾研究过从中国进口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 那时的他还只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名毕业生, 当时的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下滑的原因, 并最终得出结论: 这是长期趋势, 自动化是罪魁祸首。如果情况发展到工人们因进口竞争而失业的地步, 他们也可以相对容易地在美国

灵活的巨大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其他工作。

“正如讨论正接近尾声一样, 事实在不断发生变化。” 奥特尔这样说道, “中国的崛起正在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 制造出大批廉价的家具、纺织品以及电子电器, 加速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崛起。在 1991 年到 2012 年期间,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所占的份额从 4% 升至 24%。

奥特尔和他的合作者——苏黎世大学的大卫·多恩 (David Dorn) 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戈登·韩森 (Gordon Hanson) 表示, 美国工人受到的冲击巨大且持久。在 201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他们计算得出, 从中国的进口直接导致 1990 年到 2007 年之间损失了 153 万个工作岗位, 这大约是全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下跌数目的 1/5。工作岗位的损失主要集中于直接与中国竞争的领域, 而在其他领域, 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则缓慢很多。

“工作给人们的生活赋予了内容和意义。”

更为显著的是, 他们还发现所谓的“中国冲击”已经从制造业蔓延到与进口竞争并非直接相关的行业, 例如供应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薪资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十多年来一直疲软。(在随后的一篇论文当中, 他们估算出间接就业岗位损失达到 100 万个。) 该结果对普遍接受的有关劳动力流动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就业者如果想从一个社区换到另一个就业岗位更充足的社区或者要更换工作, 实际上并不像经济学家们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大卫质疑了最主流的观点。” 奥特尔在哈佛大学的论文导师以及临时合作人劳伦斯·卡茨 (Lawrence Katz) 表示, “人们一直以来依赖的证据实际上已经过时十几二十年了。因为流动中的摩擦, 如今的贸易成本远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大得多。”

奥特尔对于中国的研究激起了美国人民对于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损失而产生的强烈的焦虑感,

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对科技变革的浓厚兴趣是受到了他个人经历的影响。



这在2016年美国大选运动中引起了一阵骚乱。在2016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奥特尔及其合作者发现贸易冲击将投票人推向了极端政治阵营。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们写道，在贸易相关行业从业的年轻人由于工作前景惨淡和工资水平降低而在婚恋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也导致了结婚率的下跌和未婚生子情况的激增。

科技变革则是公众焦虑情绪的另一大源头——这也是令奥特尔着迷的一个课题，这份激情部分来自于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背景。到上世纪末，个人电脑在工作场所以及家庭中的使用逐渐普及，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掌握计算机技能将会如何影响人们在就业市场中的价值。

但奥特尔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他清点了工人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比如，搬动某个物体或者进行运算，并且研究哪些任务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奥特尔及其合作者发现，尽管计算机取代了很多典型中等技能工作者的日常任务，例如会计和收银员，但它同时也凸显了专业类和管理类工作中特有的解决问题技能、适应性以及创造力的价值。同时，有一些人力工作就无法由计算机替代，例如门警或者快餐工作人员。该结果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工资流向那些拥有最

高等或最低等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而中等技能劳动者则举步维艰。

这个观点来自于2002年的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银行安装了一种新的软件来处理支票，而这项工作自19世纪末开始就一直由银行职员进行人工处理。奥特尔和他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的理查德·莫纳内(Richard Murnane)和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在银行里花了大量时间采访员工和经理，并观察他们的工作。最终发现，虽然软件可以处理97%的支票，但银行员工仍然需要处理剩下的3%的问题支票——这些问题包括透支或难以辨认的签名。因此，这类工作可能需要那些掌握更多技能的员工来完成。

奥特尔表示：“人们现在需要处理更广泛的账户类别，解决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处理交易本身。”

奥特尔的研究植根于实地考察。曾有一篇文章对“为什么临时工介绍所会为求职者提供看起来完全无利可图的就职培训”作出了解释。在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期间，奥特尔在一家求职介绍所注册，以获得一手的面谈流程资料。他发现，有些公司会提供免费就职培训，以评估雇员的积极性，并且学习如何吸引那些真正想要提高自我的求职者。

同样地，他在科技变革领域的兴趣也植根于他的生活经历：在高中时，他曾通过自学为早期的个人计算机睿侠TRS-80编程。但是他从计算机转向经济学的道路却曲折重重。

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但入学后却很快辍学（“当时我极其不成熟，”他自己解释道），回到家乡波士顿，开始在一家医院里担任行政助理。随后，他成为医院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之后加入了朋友开办的一家软件咨询公司，工作内容是为一些银行开发数据库。

当他重返校园，这一次录取他的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梅德福的塔夫茨大学，专业是心理学，当时他想成为像他父母那样的临床心理学家。

但在1989年毕业的时候，“我总结认为，至少在我所学习的部分心理学当中，我很喜欢那些问题，但是我对于它们的研究方法和答案并不满意。”他说，“我拥有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

经验，但是我对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我当时并不知道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

于是，他钻进那辆花费他 250 美元买来的道奇柯尔特 (Dodge Colt)，开始到全国各地旅行，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在路上听收音机的时候，他了解到旧金山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堂正在启动一个项目，向城市里的孩子们教授电脑技能。奥特尔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那个项目，不久之后便成为那里的教育总监。

“我认为那个项目比较接近于我要寻找的东西。”奥特尔说道，“一方面，它与技术相关；另一方面，它也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所以那个项目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寻找室友的时候，他遇到了同样在寻找室友的玛丽卡·立谷 (Marika Tatsutani)，后来她成为他的妻子。当时，立谷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现在她是能源和环境领域的自由作家、编辑和顾问。他们有三个孩子，年龄在 13—20 岁之间。

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了三年后，焦躁不安的奥特尔决定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他曾经想过申请就读医学院，但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专业。由于这个专业要求修习经济学课程，在此奥特尔终于发现了他未来从事的领域。他说：“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想，‘噢，天啊，为什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有这么个领域？这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它研究的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它所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我所尊重、所重视、所喜爱的。”

奥特尔的一位教授，默南（他后来也与奥特尔在银行研究方面进行过合作）对他的好奇心和热情印象深刻。“他具有心理学背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与仅学习经济学的人相比，他看问题的视角更为宽广。”

1999 年，奥特尔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又一次踏入就业市场。他当时认为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研究所不会真正考虑录用他来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因为他的专业是公共政策。因此，当麻省理工经济学系主任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打电话通知他被录用的时候，奥特尔大吃一惊，甚至根本就不想接这个电话。

“这太可怕了。”奥特尔回忆说，“一方面，我感觉自己是这个领域最幸运的人，而另一方面我又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伪学者。我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在这干什么？”

后来成为 IMF 首席经济学家、目前是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布兰查德说：“录用奥特尔的决定确实有违常规，但他身上拥有的使命感、真才实学和对工作严肃的态度打动了我们，让我们决定打破常规。现在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没错。”

但是，开始头几年对于奥特尔来说还是很困难的，他感觉自己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他回忆说，自己被安排教授本科生宏观经济学的时候还怀疑过自己是否有资格教授这门课程。

“刚开始我想，‘哇，我真不了解这个东西，我不应该教这门课。’然后又一想，我觉得‘这倒是个学习的好方法’。”

最近，尽管奥特尔的压力有所减少，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忙碌。他被任命为国家经济研究局劳动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马斯 (Alexandre Mas) 合作。他也在教授应用微观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的本科课程。同时，他还在继续研究经济冲击如何影响政治信仰和美国的家庭结构。而且他已经开始了一项策划多年的宏大研究，探讨财政援助对大学入学率和完成率的影响。

贸易冲击将投票人推向了极端政治阵营。

繁忙的日程让他只有六小时的睡眠时间，这还得是在幸运的情况下。但是他并无怨言。

他说，人们总是慷慨地对他进行指导，给他学习的机会，从而塑造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想回报这份慷慨。“我一直都非常幸运。”^{FD}

克里斯·威尔利兹 (Chris Wellisz)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